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04-066-
執行期間：105年08月01日至106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林果顯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施長甫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郭佩瑜

報告附件：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02 日

中文摘要：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生存，致力於防堵外來威脅，原屬文化或媒體領域的出版品進口管制，亦成為國安考量的重要環節。此時的外來訊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來自日本的出版品不僅可能蘊含違反國策的左派思想，更因涉及對本省籍日文讀者的影響力，使其成為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外來資訊。然而，看似單純內政治理項目的出版品管制，並非在真空的環境下恣意制訂，管制措施的寬嚴與開放時程，涉及外交上的應對折衝，談判人員的學養經歷與政經關係，亦影響協商方向。若未討論國際因素，將難以全面理解管制政策。基於上述的多重意義，本計畫選擇聚焦於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探討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初期在決定文化政策時的國際因素。

本計畫的主要提問是：看似內政治理事項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措施，來自外交上的壓力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如何談判折衝？雙方主導政策及參與談判的人員為哪些人？更進一步而言，這些涉及文化商品的談判，反映了兩方政府何種貿易、外交與文化立場？本計畫以三類不同性質的檔案，包含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以及雙方談判人員的生平及撰述資料，企圖釐清日本出版品進口的國際談判過程，以及相關人員的學養經歷，和彼此的人脈關係。期望藉此能使出版品管制的研究跨出國內言論自由的討論，以及靜態的法規疏理，而具有冷戰時期臺日在文化事務上彼此攻防的「文化冷戰」的面向。

中文關鍵詞：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談判

英文摘要：After coming to Taiwan, the ROC government survived by the very means in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al dimensions, and tried hard to build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addition to controlling the informati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was also devoted to control the outside information. In 1950s, the major part of the outside information are the publications, and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are special.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maybe include the left thoughts and maybe influence the native Taiwanese who were governed by Japan before 1945. That makes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become the sensitive information. Besides, the control of foreign publications is not the internal affairs, it also is the international issue. Also the thought and experience of the negotiators about Japanese publications from Taiwan and Japan may effect the negotiation for the publications. For the importance and multiple research values, this project chooses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to analysis the governance strategy of the ROC government in 1950s Taiwan. What this project wants to ask is: what is the effect about the foreign pressure for the policy of Japanese publications? How did Taiwan and Japan discuss the import control policy? Who is the negotiators? Further, what is the standpoint of trade, diplomacy and culture from the

negotiation?, This project will use the recently released archives of the ROC govern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OC and Japan, and the diary, biography and writings of the negotiators. And this project want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on, the experience and relations of the negotia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method above, this project will not take the approach of speech free and the arrangement of laws, and will discuss the issue about culture cold war.

英文關鍵詞： Japanese Publications, Import Control, Negotiation

計畫題目：1950 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
The Negotiation of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in 1950s Taiwan

一、前言

本計畫的主要提問是：看似內政治理事項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措施，來自外交上的壓力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如何談判折衝？雙方主導政策及參與談判的人員為哪些人？更進一步而言，這些涉及文化商品的談判，反映了兩方政府何種貿易、外交與文化立場？

1950 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生存，致力於防堵外來威脅，包括軍事力量、滲透人員，以及危險資訊，原屬文化或媒體領域的出版品進口管制，亦成為國安考量的重要環節。此時的外來訊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來自日本的出版品不僅可能蘊含違反國策的左派思想，更因涉及對本省籍日文讀者的影響力，使其成為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外來資訊。基於此，去年核定的計畫「1950 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初探」(MOST 104-2410-H-004-084)，企圖疏理過去較少被提及的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管制體系，透過政府檔案，逐步釐清各時期的相關法規與諸政府部門的任務職權。

本計畫發想的背景，即為去年計畫的延伸。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有個問題逐漸浮現：這些看似國內的文化管制事項，並非在真空的環境下恣意制訂，由於涉及外國出版品，來自日本的要求屢屢出現在內部討論的公文中，那麼，這些外交壓力何時正式排入雙方政府代表談判的議程？雙方的訴求與攻防過程為何？這些問題若不回答，將無法更全面地呈現當時臺灣的文化管制狀態與決策過程。同時，臺日雙方透過什麼機制溝通協調，彼此攻防的重點和底線，也反映了兩國的外交關係與策略。

二、研究目的

1950 年代臺日雙方的關係歷經多重變化，彼此的政府型態、在亞洲冷戰中的定位，以及國家面對的戰略困境，每一階段的難題皆影響兩國之間的往來。兩國之間從無邦交到建交，從延期性的貿易協定會談，進展為官民團體定期互訪開會的形式，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便是在此過程中，逐步成為重要議題。換言之，在國內管制體系的研究基礎上，透過臺日雙方的檔案，釐清外國出版品的國際協商面向，既為本計畫的發想背景，也是計畫欲達成的首要目的。

其次，在僵硬的法規文字和繁複的會議記錄背後，是來自不同部門的政府官員。日本在戰後臺灣具有特殊而敏感的地位，既是必須清理的前殖民者遺緒，卻又同時是亞洲反共陣營的伙伴，這些人除了因為所擔任的黨政職位而成為政策擬訂者或躍上談判桌，其學養經歷所

展現對文化事務的想法，以及對歷史、文化和國家立場的理解，皆影響了日本出版品進口的談判內容與方向。另一方面，透過兩方的資料，也可初步掌握日方的主要談判人員，進一步按圖索驥。日本在 1952 年脫離美國佔領後，積極尋求自己的亞洲政策，在此過程中，又是哪些人、基於什麼態度與臺灣交涉？這也是過去討論國內文化政策時較少碰觸的議題。總之，讓日本出版品政策談判者的面貌浮現，為本計畫的第二個目的。

綜合以上研究背景與目的，本計畫希望在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的研究上，聚焦過去較少被關注的國際因素，並能分析參與其中的人員背景，使得此研究在既有制度面的疏理之外，增添更多元而動態的形成過程，讓主事者有更為具體的樣貌。並且，在臺灣的人事之外，旁及談判對手的日方人員，使得本計畫不僅限於描述臺灣的人事物，而是擴展到臺灣與當時世界的互動情形。如此，出版品管制將不僅限於言論自由或文化政策的領域，而能跨足到冷戰時期臺日在文化事務上的國際攻防，亦即亞洲版本的「文化冷戰」(culture cold war)議題。¹同時，出版品管制也不再僅停留於法規整理或案例檢討，繁複的人際網絡將可凸顯具體個人的角色。以上兩種途徑，將可延伸出更多種研究的可能。豐富此研究的觀察視角，修正或補充既有的歷史圖像，為本計畫的重要性與可能影響所在。

三、史料簡介與文獻探討

(一)史料簡介

為了探討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就出版品進口管制的談判過程，勢必同時關照雙方的資料，同時，又為了對參與人員進行研究，涉及生平經歷與重要撰述，因此資料相當龐雜。依史料性質分為三類，一是中華民國外交部與相關政府檔案，二是日本外務省檔案，三是各自參與人員的相關資料。臺灣方面的資料，以《外交部檔案》最直接相關。與國外出版品相關的卷宗多半度藏於國史館，包含〈新聞書刊審查〉、〈新聞限制〉、〈日文書刊進口〉等卷宗，這些公文可以看出 1950 年之後不同時間點來自日方的要求，以及政府內部的討論與反應。而與日本出版品相關的其他政府機構，包含行政院、內政部、教育部與省級機關檔案，特別是中日和約簽訂前後對於日方要求出版品管制開放的討論，在去年的計畫中已有初步蒐集整理，將在此基礎上聚焦外交因素的影響。

在《外交部檔案》中，收藏於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中日合作策進會」(日文名稱為「日華協力委員会」)相關卷宗，是本計畫的核心史料之一。臺日雙方從 1950 年代開始，在美國主導下建立貿易關係(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Occupied Japan)，當美國結束占領後，雙方亦在中日和約的精神下重新架構彼此貿易關係(中日貿易協定)。對於文化議題，雖於 1951 年即開始交涉將臺灣電影輸出至日本，但有關日本出版品管制的定期正式會談，卻是由「中

¹ 貴志俊彦、土屋由香(編)，《文化冷戰の時代 アメリカとアジア》(東京：國際書院，2009)。

日合作策進會」開始。²該會成立於 1957 年，由時任日本副首相石井光次郎與張群居中促成，由臺日各派委員合組，即便在此之前已有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但該會僅由臺灣單方面組成，策進會可說是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影響力也最廣泛的半官民團體。該會下設政治、經濟與文化小組，由雙方黨政、商界與學術文化界人士參與，就反共事業、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事項，廣泛討論，並將結論攜回雙方政府，具體落實。³其中，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成為文化小組在前幾次會議中的重要議題，配合外交部門的相關資料，可掌握雙方交鋒的梗概。

相對於臺灣方面的資料，日方亦有關於「日華協力委員会」以及出版品輸出相關資料，此即第二類史料的日本《外務省檔案》(收藏於外交史料館)。有關委員會的檔案為「本邦における協会及び文化団体関係 日華協力委員会関係」(I'.1.8.1.1-56)，此部分與臺灣方面相去不遠，不過日文版本對於會議召開的流程細節與會議描述更為詳細，可與臺灣資料比對補充。而促成該委員會的訪問團檔案「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使節団関係(石井光次郎団長)」(A'.1.5.1.1-2)，亦可看出日方對於出版品的要求在中日合作策進會成立前已展開的概要。另外，外交史料館收藏有 1950 年代歷年臺日雙方的貿易談判資料，包含「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関係」第 1-14 卷(B'.5.2.0.J/C(N)1)，以及「在外公館長会議関係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公館公館長会議」(M'.3.1.7.8-2)等卷宗，有助於理解雙方 1950 年代的談判重點、進出口項目與數額，以及包含電影等文化產品在貿易談判中的角色。

上述日本所藏資料是申請者三年來自費前往東京蒐集所得，但包含「中華民國對外經濟關係雜件 貿易関係」(E'.3.1.1.5-1)以及「本邦諸外国文化交換関係」(I'.1.1.0.3)等相關卷宗仍未及蒐集，且內容亦尚待解讀分析，有待本計畫的支持。

第三類的史料為臺日雙方出版品談判相關人員的生平資料與撰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成員，以前兩次會議為例，第一次會議臺灣方面成員為陳雪屏(委員長，臺大教授兼正中書局董事長)、吳俊升(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與張伯謹(駐日公使)，第二次會議與會人員增多，包含陳雪屏、吳俊升、汪公紀、方豪、王星舟、朱新民、李樸生、陳固亭、張興周、游彌堅、劉真與謝東閔。日本方面，第一次會議文化小組成員為矢部貞治(委員長，拓殖大學校長)、赤松要(一橋大學教授)與高山岩男(日本大學教授)，第二次會議成員則為矢部貞治、高山岩男、井口貞夫(前日本駐美大使)、北村隆。⁴文化小組成員每次會議皆稍有變動，但核心成員可大致掌握，從這些人的日記與著作，可追索雙方對於出版品事項的看法。

以日方文化小組委員長矢部貞治為例，不論在委員會或在報章雜誌上，均積極推動日本出版品輸出至臺灣。在其記述詳細的日記《矢部貞治日記 紅葉の巻》中，詳記會議情形，也參與「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致力將日本出版品推銷至世界，特別是東南亞，並曾於拓殖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出版的刊物《海外事情》上，發表來臺訪問的感想。其著作由政策研究

² 川島真(等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頁53-54。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臺灣歷史年表 終戰篇 I (1945-1965)》(臺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3)，頁120、230。

³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濟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臺灣文獻》，63:3(2012.9)，頁91-124。

⁴ 「日華協力委員会懇談会記録」，〈本邦における協会及び文化団体関係 日華協力委員会関係〉，《外務省檔案》，日本外交史料館藏，管理番號：I'.1.8.1.1-56。

大學院大學編成《矢部貞治關係文書目錄》，並已數位保存收藏，私藏文書與筆記則收於憲政紀念館(眾議院事務局)。⁵光是一位人物，即有如此豐富的資料有待追尋，並可拓展至日本在冷戰時期的文化外交策略，使本計畫具有相當的延伸性。

上述資料數量龐大，收藏地分散錯落，甚至跨國，檔案卷宗的分類與本計畫亦非完全相合，必須耗費相當的時間精力加以蒐集和篩選，因此，必須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以支撐此研究。

(二)文獻探討

過去學界對此一問題著墨不多，主要成果在於兩方面，一是對於日本出版品的管制研究，另一則是對於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日本出版品問題以何義麟的研究最為直接重要，何氏〈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以印刷媒體之管理政策為中心〉以印刷媒體為中心，旁及廣播與電影，勾勒戰後初期臺灣禁用日文的政策內容與變遷。何氏利用政府公報及報紙，整理1945年至1950年臺灣緊縮日文空間的法規民間反應，並分疏二二八事件、國語運動及戒嚴令頒布對日文資訊的管制。由於該文關切的是日本語文在臺灣所可存在的空間，因而對於日本出版品的進口管制亦有涉及，可惜僅止於1950年省政府成立「日文書刊暨日本語影片審查會」的初期運作為止。⁶該文所提供的線索，包括語言空間的形成與管制，以及點出報紙、書籍和雜誌管制措施的不同，均為本計畫重要的研究基礎。不過，較為可惜的是並未涉及國際談判的部分。

而有關1950年代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多偏向臺灣如何重建與日本的經濟關係，幾乎未涉及貿易談判中的出版品事項。⁷與本計畫較相關者為「中日合作策進會」的研究，以徐年生和洪紹洋為代表。徐年生的博士論文〈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關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在日本外交史的脈絡下，檢視「中日合作策進會」在日華關係上的地位，說明日方降低此會的政治色彩，促進文化交流和貿易關係改善的企圖。同時，徐氏指出在策進會成立前的一年的石井光次郎訪華團中，已開始提及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提供本計畫探討此問題的線索。⁸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建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則關注此會在引進日資參與臺灣經建計畫的過程，強調1950年代末期以來日本在臺灣經濟上的角色，修正了過去對美援過度評價的看法。雖然僅略為提及，但作者亦注意到策進會對於文化事項的討論，而洪氏系統性地整理了策進會十五年的發展梗概，有助於整體性地了解該會的

⁵ 矢部貞治，《矢部貞治日記 紅葉の巻》(東京：読売新聞社，1975)；《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政策情報研究センター(編)，《矢部貞治關係文書目錄》(東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政策情報研究センター，2001)。

⁶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雪・川口隆行(編著)，《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頁46-77。

⁷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著)，《台湾の經濟 典型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頁261-312；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臺北：稻鄉，2005)。薛化元(總編)，《臺灣貿易史》(臺北：外貿協會，2008)，頁242-245。

⁸ 徐年生，〈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關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札幌：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7)，頁141-148。

組織與功能，以及文化事項在此會討論議題中的定位。⁹

整體而言，戰後初期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研究已有部分具體成果，但對於 1950 年代全面性的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特別是外交因素並未被討論。而關於臺日貿易談判內容，既有研究偏向外交關係的摸索，以及經濟面向的合作，對於出版品進口問題甚少提及。本計畫在上述研究基礎上，發掘貿易談判中較少被提起的文化面向，期望有所突破。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計畫將以歷史學的研究法，亦即蒐集與整理一手和二手史料，將其放置於具體歷史時空脈絡中，加以互證、比較與尋求聯繫。現代歷史學講求證據的多元採擷與真偽考訂，後現代歷史學則在對求真的辯詰思考與正視歷史的斷裂之外，尋求脈絡的建立、敘事背後的權力運作與知識系譜。本計畫所使用的研究法，即是以現代歷史學方法為基礎蒐集考訂史料，並意識到後現代史學論點，對資料進行解讀分析。

首先在資料蒐集上，本計畫所涉及的史料範圍甚廣，將按上述三個層次，以(1)日本出版品管制及「中日合作策進會」為主的《外交部檔案》，並旁及行政院、教育部、內政部、及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等政府機關檔案，(2)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檔案》，特別集中臺日貿易相關卷宗，(3)參與及談判人的生平資料與書籍論著為蒐集對象。在蒐集完成後透過閱讀，對相關內容進行分類，以掌握管制政策與體系的形塑過程。其次，結合上述資料，將所有資料以時繫事，按發表時序製作文獻編年資料庫。如此不僅可初步統整所有經考訂過的資料，並可在時序中考察不同史料間的彼此聯繫，期能在多元檔案(multi-archives)的基礎上，互相考證補充，拼湊 1950 年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較完整的樣貌。

(二)進行步驟

在史料蒐集上，首先影印蒐集上述三類檔案，並在蒐集過程中同時筆記，以隨時修正或新增資料蒐集的方向，建立基本史實的認識。在史料蒐集約進行一半時，開始同步著手製作編年資料庫。如同上述研究方法所述，依史料出現年份，在時間縱軸上依序排列，整合不同性質與來源的史料。待資料蒐集與閱讀結束、編年資料庫亦完成後，描繪政策與體制的形成過程，並藉由呈現政策背後的考量。最後，藉由以上史料與分析的基礎，草擬與發表論文。

⁹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濟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頁100-101。

五、研究結果

本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於「走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學術研討會，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歷史學會，2017年5月21日。

戒嚴時期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關鍵人士： 以矢部貞治和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成員為中心

林果顯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想處理的問題是：在戒嚴初期的1950年代，從日本進口流通於臺灣的日文出版品，究竟是誰？用什麼方式？達成了什麼？又沒達成什麼？過去有關戰後臺灣的日本出版品，多從新聞言論管制面，或是文化政策著手，描繪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對內部肅清外來資訊的圖像。本文則從外交層面著手，指出外國出版品並非單純內政治理的項目，特別是在1952年的「中日和約」生效後，中華民國政府面臨來自日方的壓力，必須透過談判決定哪些出版品必須阻擋，哪些出版品則可以進口。1956年的石井訪問團，以及1957年的「中日合作策進會」正式將出版品進口至臺灣設定為重要交涉事項。其中，策進會下的文化小組日方代表以矢部貞治為首，臺灣代表以陳雪屏為首，展開多回合的交涉，促使中對民國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調整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鑒於資料，本文以著述較豐的矢部貞治為中心，旁及日本與臺灣方面小組成員，整理這些人的重要背景、言論與談判過程中的角色，釐清日本出版品進口決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以修正並補充對戒嚴時期臺灣言論環境的認識。

關鍵詞：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資訊管制、矢部貞治

一、前言

本文意在探問：看似內政治理事項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措施，來自外交上的壓力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如何談判折衝？雙方主導政策及參與談判的人員為哪些人？更進一步而言，這些涉及文化商品的談判，反映了兩方政府何種貿易、外交與文化立場？1950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生存，致力於防堵外來威脅，包括軍事力量、滲透人員與危險資訊，原屬文化或媒體領域的出版品進口管制，亦成為國安考量的重要環節。此時的外來訊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來自日本的出版品不僅可能蘊含違反國策的左派思想，更因涉及對本省籍日文讀者的影響力，使其成為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外來資訊。

過去筆者曾針對戰後日本出版品進口的問題，梳理中華民國黨政軍機構如何逐步建立管制體系。¹⁰然而，看似國內的文化管制事項，並非在真空的環境下恣意制訂，由於涉及外國出版品，來自日本的要求屢屢出現在內部討論的公文中，那麼，這些外交壓力何時正式排入雙方代表談判的議程？雙方的訴求與攻防過程為何？這些問題若未解決，將無法更全面地呈現當時臺灣的文化管制狀態與決策過程。同時，臺日雙方透過什麼機制溝通協調，彼此攻防的重點和底線，也反映了兩國的外交關係與策略。1950年代臺日雙方的關係歷經多重變化，彼此的政府型態、在亞洲冷戰體系中的定位，以及國家面對的戰略困境，每一階段的各自難題影響兩國之間的往來。兩國從非常態性的訪問團交換意見，進展到共組委員會企圖解決問題，除了是對聯繫管道的摸索，其中所提出的議題與討論過程，也顯示雙方的自我表述與彼此理解，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便是在此過程中浮上檯面。換言之，本文意圖在國內管制體系的研究基礎上，透過臺日雙方的檔案，釐清外國出版品的國際協商面向，即為本文的首要目的。

其次，在僵硬的法規文字和繁複的會議記錄背後，是來自不同部門的政府官員。日本在戰後臺灣具有特殊而敏感的地位，既是必須清理的前殖民者遺緒，卻又同時是亞洲反共陣營的伙伴，另一方面，透過兩方的資料，也可初步掌握日方的主要談判人員，進一步按圖索驥。日本在1952年脫離美國佔領後，積極尋求自己的亞洲政策，在此過程中，又是哪些人、基於什麼態度與臺灣交涉？這也是過去討論國內文化政策時較少碰觸的議題。總之，讓日本出版品政策談判者的面貌浮現，為本計畫的第二個目的。

綜合上述的目的，本文希望在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的研究上，聚焦過去較少被關注的國際因素，並能分析參與其中的人員背景，使得此研究在既有制度面的梳理之外，增添更多元而動態的形成過程，讓主事者有更為具體的樣貌。本文希望從談判對手的日方人員，窺探臺灣與當時世界的互動情形，如此，出版品管制將不僅限於言論自由或文化政策的領域，而能跨足到冷戰時期臺日在文化事務上的國際攻防，亦即亞洲版本的「文化冷戰」(culture cold war)

¹⁰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臺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2016.5)，頁193-250。

議題。¹¹同時，出版品管制也不再僅停留於法規整理或案例檢討，繁複的人際網絡將可凸顯具體個人的角色。

過去學界對此一問題著墨不多，主要成果在於兩方面，一是對於日本出版品的管制研究，另一則是對於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日本出版品問題以何義麟的研究為先驅，他以印刷媒體為中心，勾勒戰後初期臺灣禁用日文的政策內容與變遷。該文關切日本語文在臺灣所可能存在的空間，因而對於日本出版品的進口管制亦有涉及，可惜僅止於 1950 年，未及談論中央政府來臺後的管制，以及兩國建交後的協商過程。¹²林果顯透過黨政軍機構的檔案，補足了 1950 至 196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過程，有助理解中華民國統治者的態度與法規，但與何氏的研究相同，側重臺灣內部的情況，並未著墨外部談判的部分。而有關 1950 年代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多偏向臺灣如何重建與日本的經濟關係，幾乎未涉及貿易談判中的出版品事項。¹³與本計畫較相關者為「中日合作策進會」的研究，以徐年生和洪紹洋為代表。徐氏檢視「中日合作策進會」在日華關係上的地位，說明日方促進文化交流和貿易關係改善的企圖，並指出在策進會成立前一年的石井光次郎訪華團中，已開始提及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提供本文線索。¹⁴洪紹洋則關注此會在引進日資參與臺灣經建計畫的過程，雖然僅略為提及，亦注意到策進會對於文化事項的討論，而洪氏系統性地整理了策進會十五年的發展梗概，有助於整體性地了解文化事項在此會討論議題中的定位。¹⁵

整體而言，戰後初期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研究已有部分具體成果，但對於 1950 年代全面性的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特別是外交因素並未被討論。而關於臺日貿易談判內容，既有研究偏向外交關係的摸索，以及經濟面向的合作，對於出版品進口問題甚少提及。本文將利用中華民國外交部與相關政府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以及參與人員的相關資料，重建談判過程與釐清成員背景，特別是日方主要談判代表矢部貞治，是出版品議題的主要提出者，其背景、思想與經歷，有助於理解當時日本對文化議題的態度。矢部戰後的生平資料主要藏於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交涉時擔任校長的拓殖大學校史中亦有相關資料，所出版日記及在報刊所發表文章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透過上述資料，本文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發掘貿易談判中較少被提起的文化面向。

¹¹ 貴志俊彦、土屋由香(編)，《文化冷戰の時代 アメリカとアジア》(東京：國際書院，2009)。

¹²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雲・川口隆行(編著)，《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頁46-77。

¹³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著)，《台湾の經濟 典型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頁261-312；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臺北：稻鄉，2005)。薛化元(總編)，《臺灣貿易史》(臺北：外貿協會，2008)，頁242-245。

¹⁴ 徐年生，〈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關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札幌：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7)，頁141-148。

¹⁵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濟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頁100-101。

二、高層會談中的兩兵相接：石井訪問團(1956年)

先行研究指出，依主管機關的不同，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進口約可分為四個階段，而 1956 年的石井訪問團，可說正好在政策的轉折點。第一階段(1949-1950)無主管單位，政策上致力於清除日本文化，自然也不會建立正式的進口管道；第二階段(1950-1957)為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主管時期，開始正視日本出版品在臺灣的流通情形，整合黨政軍機構，在政策上嚴格限制進口。此階段同時也面臨 1952 年兩國簽訂和約，來自日方要求進口的壓力日益增加。第三階段(1957-1962)為教育部主管時期，政策上的方向從「管制」轉為「交流」，主管單位從省級機關提升為中央部會，日本出版品成為雙方親善友好的證明之一，不過對於涉及左派或政治性的內容仍排除在外。第四階段(1962-1972)為內政部主管時期，主要反映中華民國管制體系的簡化與整合，但在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政策上立即緊縮出版品進口。¹⁶由此歷程可知，日本出版品的進口政策，深受內外情勢的影響，特別是在 1950 年代中期的重大轉折，與外部壓力有密切關係，此即石 訪問團所開啟的出版品進口交涉。

1956 年 8 月，甫成立的自由民主黨總務會長與重要派系領袖、日後成為副首相的石井光次郎，率領政經與文化界人士來臺訪問，揭示了兩國關係更趨緊密的可能。1952 年台北和約簽訂後，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並未如預期熱絡。對日本而言，脫離美國統治與發展經濟為證明日本戰後復興的最佳明證，在外交上與蘇聯拉近關係，在商業上與中國進行民間貿易，皆意圖顯示日本不再對美國的政策亦步亦趨，面對執行「反共抗俄」國策的中華民國，自然相對冷落。¹⁷1955 年自由民主黨成立，雖屬保守政黨聯合執政，但黨內派系眾多，抱持上述立場的勢力所在多有，並蘇聯進行恢復邦交之舉。在此氣氛下，石井光次郎所率領跨黨派的訪問團來臺，自是雙方外交上的一件大事，中華民國意圖藉此壓制日本親蘇勢力，也是日本政界親台力量展現的場合。¹⁸

(三)成員

被稱為「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的一行人，其組成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三方面人士，雙方對此訪問團的定位略有不同。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認識中，政治組的石井光次郎被視為下屆總理的熱門人選，松岡駒吉為在野黨社會黨中的反共核心，矢次一夫所屬的國策研究會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團體。¹⁹經濟組領導者堀越禎三所代表的經團連為日本最重要的財經

¹⁶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臺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頁236-237。

¹⁷ 川島真(等著)，《日台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52-60。

¹⁸ 此訪問團有駐日大使館的運作。「沈觀鼎電文」，1956年7月18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

¹⁹ 矢次一夫可說是訪問團的重要推手，所屬的國策研究會多人參與此團與之後的策進會。徐年生，〈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摸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頁138-139。

界團體，而文化小組領導者御手洗辰雄則是重要的記者與政治評論家。在上述認識下，臺灣方面對此訪問團相當重視，認為將可有效地擴大日本政界中的反共力量。²⁰相對而言，日本將此訪問團定位為民間層次，團長石井雖是自民黨內派系領導者之一，但其身為國會議員，係屬民意代表，其餘成員刻意選擇非政府人士。國策研究會被視為自民黨中石井派的外圍智庫，矢次同時也是此訪問團的組織者，因而此團可視為石井派民間力量的展現(成員詳見表 1)。

21

表1 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名單

姓名	簡歷	姓名	簡歷
石井光次郎(團長)	自民黨總務會長(政)	田中東馬	日本曹達專務
堀越禎三(副團長)	經團連事務局長(經)	青木好之	TOYOTA 副社長
御手洗辰雄(副團長)	評論家(文)	清水芳夫	日本鋼管會社常務理事
矢次一夫(事務局長)	國策研究會常任理事(政)	曾田作	沢山汽船取締役
政治小組		七海久	森永乳業常務
松岡駒吉	社會黨眾議員	中村作一	久保田製作所取締役
矢部貞治	拓殖大學校長	文化小組	
細川隆元	評論家	澁澤敬三	國際電信電話社長
上村健太郎	前防衛廳航空幕僚長	清田良知	國際電信電話通信部次長
種田鉄馬	映連顧問	春日由三	NHK 廣播局長
經濟小組		鍋山貞親	評論家
佐藤久喜	三井金屬工業社長	宮田重雄	醫學博士、畫家
土光敏夫	石川島重工業社長	石井公一郎	團長秘書
高橋龜吉	經濟學博士	加藤昇	日華文化政經聯誼會幹事 長

出處：「為呈報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名單及履歷由」，1956年7月3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

其中文化小組的成員以媒體主管和評論家為主，這與雙方希望擴大媒體產業合作與輿論力量的有關，澁澤、清田和春日負責廣播節目交換、技術合作與電視臺籌備等議題，宮田的畫家身分則針對雙方的美術交流問題發言，鍋山為前共產黨轉向者，因為熟悉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對抗左派言論的大家，而御手洗為記者兼評論家，在文化議題上代表新聞界發言。除此之外，參與文化事務發言且居重要角色的不僅是文化小組成員，因為訪問團在臺期間分組

²⁰ 「宋越倫函」，1956年7月3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

²¹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政治小組第一次談話會速記錄」，1956年8月2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別於官方的期待，後來亦有觀察指出到了中日合作策進會時期，石井的派系力量下降，其政經力量及媒體效應並不如臺灣方面所設想。司馬桑敦，〈從東京看中日合作策進會議〉，《中日關係二十五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頁33-38。

舉行不公開的談話會與公開的座談會，成員不限於原本的分組，因而原屬其他組別的成員亦對出版品事務發言。其中評論家細川隆元三場都參與，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治、NHK 廣播局長春日由三及隨團的朝日新聞記者橋本文雄參與兩場(詳見表 2)。相對地，臺灣方面除了學者及民間媒體人士外，黨政相關機構主管出席比例不小，擔任談話會主席為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其他有立法院長張道藩、新聞局副局長朱新民、臺灣省政府秘書長謝東閔、臺灣省政府新聞處張吳錫澤、前臺灣省教育廳廳長陳雪屏與前教育部長杭立武等。整體來說，雙方成員並不對等，日方派出學術界與媒體界重要人士，人數雖不多，但每個人皆有特別著重的領域，臺方除了具份量的學者外，多位部會首長出席也顯見對此會議的重視，某個程度上，也表示會議上的發言代表的是官方的立場，而非完全自己的心聲。究竟誰扮演什麼角色，無法單從身份背景知得，須進一步由會議過程才能掌握。

表2 文化小組談話會與座談會出席成員

第一次談話會	1956 年 8 月 20 日
日方：石井光次郎、矢次一次、細川隆元、宮田重雄、橋本文雄(記者)	
臺方：張其昀(主席)、倪文亞、陳雪屏、張道藩、沈剛伯、謝東閔、雷震、朱新民、陳固亭、杭立武、吳俊升、錢穆、王武、鈕先銘、余仲剛、成和	
第二次談話會	1956 年 8 月 21 日
日方：細川隆元、橋本文雄、矢部貞治、春日由三、種田鐵馬、淺田泰三、	
臺方：張其昀(主席)、雷震、蔭孟武、沈遵晦、陳固亭、馬星野、羅家倫、陳雪屏、吳俊升、沈剛伯、吳錫澤、謝然之、朱新民、李葉、張道藩、趙君豪、加昇	
座談會	1956 年 8 月 22 日
日方：細川隆元、矢部貞治、宮田重雄、春日由三、中村作一	
臺方：陳雪屏(主席)、立法院與監察院教育委員會委員、考試委員、大學校長、教授、各報社社長、總主筆、總編輯(發言者：錢思亮、杭立武、張維翰)	

出處：「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

(四) 會議過程

8 月 20 日文化小組舉行第一次談話會，一開始日方就鎖定言論自由與出版品進口問題。評論家細川隆元第一個發言即對臺灣媒體環境發難，直言臺灣的報紙和戰時日本一樣，無法看出世界大勢，且醫學與法學雜誌無法進口，難以談到真正的「中日合作」。細川並提到，他曾向臺大校長建議，應設置機構先行審查，剔除容共的書刊。主席張其昀指定朱新民和陳雪屏回應，朱氏以篇幅限制為報紙內容辯護，陳氏則以曾參加省府審查工作的經驗，說明雜誌

審查一是為了「思想」，二是外匯限制，並透露正研擬改進審查作業。²²

陳雪屏所說的是 1951 年 8 月修正的「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該辦法明訂禁止進口原則：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者、不適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者、破壞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風俗者、提倡迷信邪說者。同時，進口數額以 1950 年 8 月至 1951 年 5 月這十個月所耗外匯平均數為準。²³問題是，這個法規制訂於 1951 年，是在「中日和約」簽訂前，日方目的就是要突破既有限制，臺方均以現況回答，雙方沒有交集。

隔天進行的第二次談話會日方繼續提議擴充審查機構的功能，並且進行實質攻防。屬於政治組的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部率先發言，認為審查機構除了篩選書刊外，亦可排除部分「親共容共」的學者及留學生，以促進雙方的學術交流。有意思的是，矢部說的是「書刊交換」，因此主席張其昀答以中央圖書館與世界 150 個大學交換圖書，並將問題導向增加書刊交換單位。隨行採訪的朝日新聞政治部記者橋本文雄指出日本報紙被限制進口的情形，唯一准許的《內外時報》在日本閱讀人口很少，希望其他報紙亦能進口，評論家細川隆元則提議或許可預從朝日、每日、讀賣與產經四大報選定一種並限制份數，提供給臺灣政府高層人士閱讀，「因為日本是言論最自由的國家」，可以確知日本的情形。新聞處長吳錫澤則回應並非僅針對日本報紙，而是對所有外來報紙都嚴格限制，因為須有「堅定的反共立場」，不得限制。另外，日本電影協會主席種田鐵馬質問為何每年日本電影進口臺灣只有 24 部，但英國片 48 部，美國片無限制，是不是「本地二十五歲以上的人都會說日本話，如果多看日本片可能會發生對日本有一種追慕的感情」。新聞局副局長自然否認只限制日本片，而是限制所有外國片，張道藩亦否認「本地青年」追慕日本。²⁴

雖然雙方行禮如儀，但日方以「文化交流」和「言論自由」為主張，不斷質疑出版品的管制。臺方的回答一直左支右絀，只能不斷澄清非針對日本而限制，而限制目的是為了防堵共產思想進入臺灣。其實，這些回答及攻防早從 1950 年即開始，特別是「中日和約」簽訂後，來自日方質問從未間斷，外交部透過不斷地發文請示，仍無法給予日方滿意的答覆。²⁵有意思的是，談話會上能回答這些問題的都是主管的政府官員，發問的日本民間人士彷彿質詢般地是出尖銳的「臆想」與「傳聞」，顯見日方對於出版品進口問題有備而來，相對地，臺方的官員如臨大敵，努力堅守底線。在此情況下，日方成員只能透過更高層次的影響力，希望能有所突破。

第二次談話會結束後，部分訪問團成員進總統府與蔣介石會談，當面提出擴大文化交流的議題。²⁶當時是由矢部貞治提出，希望能解決日文書報銷售臺灣問題，希望能在東京的駐日

²² 「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第一次談話會速紀錄」，1956年8月2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

²³ 「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1951年8月23日臺灣省政府頒發，《臺灣省政府公報》，40年秋字第47期(1951.11.26)，頁570、572。

²⁴ 「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第一次談話會速紀錄」，1956年8月20日，

²⁵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臺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頁212-219。

²⁶ 1956年8月21日下午，御手洗辰雄、鍋山貞親、高橋龜吉、矢部貞治及矢次一夫拜訪蔣介石。矢次一夫，〈自由中国親善訪問に関する報告(一)〉，《新國策》，4:26(1956.10.5)，頁3。

大使館內設置「中日聯席委員會」，以審查日本書報雜誌及學術書籍，而蔣介石欣然同意。²⁷這其實是第一次談話會時的提議，但兩次談話會都未見具體回應，因此直接爭取蔣的同意，並由訪問團成員評論家御手洗辰雄返日後於披露於報端。²⁸隔天公開形式的座談會上，細川隆元開場致辭時即透露與蔣會面一事，並說總統指示應該在出版品交換上有具體作為，這一切的作法，皆可理解為日方積極將此事公開、希望逼迫臺方解釋出版品輸臺障礙。²⁹但截至整個代表團離開為止，臺灣方面對此問題並無太直接的承諾。

(五)「交流」的真意與伏筆

為何在雙方都想加強交流的情況下，臺方對於日方提議卻未見積極呢？這必須回到此次臺灣對訪問團的預想與日方有極大差距。臺灣方面一開始的出發點就鎖定政治目的，希望藉由「反共同盟」、經濟合作和「澄清思想界」的方式，透過此訪問團強化日本的「反共」力量，因此臺方為文化小組座談會所設定的議題即為「如何加強中日文化加流」與「如何建立中日兩國文化界之反共團結」。如前所述，此時正值日本與蘇聯談判和約前夕，對於將任何與共產集團接觸、貿易、談判皆視為妥協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希望能透過訪問團影響日本政策和輿論，這也就能理解何以在各種會議中近乎執拗地要求日本「反共」。總統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清楚地說明了此種戰略：³⁰

日本訪華團之結果尚佳，而日俄和約未能訂成，重光經由倫敦會議後直接回日本，而未回莫斯科繼續交涉，是完全達到余所期之目的，不能不說是東亞對俄鬥爭成敗之一重大關鍵也。

如果政府最高層已有此種認識，出席官員與會議走向自然也將政治目的當成最重要的事項。舉辦各種座談會「教導」日方反共知識，質疑日方對共產黨太過寬鬆，最後希望日本加入「亞洲反共聯盟」，是臺方最重要的工作。

相對而言，在經濟上擴大海外市場，在文化上重新輸出日本文化商品是日方的主要任務。³¹觀察文化小組的會議過程，電影、書籍雜誌、報紙、學術交流、繪畫與音樂領域各有專人負責發言，並收攏於「中日聯席委員會」，希望能打破既有的行政框架。事實上，他們在訪臺期間察覺臺方強力運作反共聯盟一事，除了決定予以婉拒外，並集中力量在文化和經濟合作，此點已可見雙方基本差距。³²另一方面，當時日本國內氣氛，對於左派思想、共產黨，或是中

²⁷ 〈沈觀鼎致葉公超函〉，1956年9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4。

²⁸ 御手洗辰雄，〈農民が日本人の銅像 蔣總統もよき理解者〉，《讀賣新聞夕刊》，1956年9月18日，第1版。御手洗辰雄回日後以連續七天連載形式，將訪臺見聞投稿於《讀賣新聞夕刊》，之後濃縮翻譯成中文，刊載於《中央日報》（1956年9月26、27日），可見得黨政方面已知總統所做的承諾。

²⁹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座談會速記錄」，1956年8月22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

³⁰ 《蔣介石日記》，1956年8月25日。

³¹ 高橋龜吉，〈台湾經濟を視察し わが經濟の發展余地意外い多大 わが朝野の新研究を要す〉，《投資經濟》47:8(1956.9.11)，頁5-7。

³² 矢部貞治，《矢部貞治日記 紅葉の巻》（東京：読売新聞社，1975），頁208。

華人民共和國抱有同情者比例甚高，將左派與「民主」、或「進步」相互聯結，相對地，中華民國政府則被視為右派或獨裁的政權。訪問團中主張反共者，其實在日本社會中須承受一定壓力，而這也是將訪問團設定為民間層次、希望降至來訪阻力的原因之一。亦即，石井訪問團已屬同情中華民國的立場，並且期待在經濟與文化上達成實績，以在當時親中共氣氛之外另闢蹊徑。但臺方多談原則，少談實際問題，讓日方對交流前景產生疑慮。

茲以兩位團員回日本後所寫文章為例，說明他們在中華民國政府熱情款待後，對日本大眾所介紹的臺灣文化印象。御手洗辰雄以〈徹底的言論統制 學問上的鎖國狀態〉為題，報導當時臺灣限制外國出版品的嚴酷現象。文中指出臺灣處於比日本戰時還更嚴厲的言論統制，報紙與廣播所報導的新聞皆口徑一致，充斥著政黨與政府的說教，而從一般性到專業性的出版品皆嚴格限制進口，日本報紙只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低俗報紙(指《內外時報》)，雜誌只有兩份婦女雜誌，一般的日本出版品全面禁止進口。御手洗多次以日本戰時的言論管制為例，認為此種媒體無味的宣傳效果不彰，而且沒有言論自由將降低對其他思想的吸收力與抵抗力，「歷史殷鑑不遠」。³³細川隆元直言，所謂「中日文化交流」只能由日本單方面供給，「中國文化水準之低，實出本人意料之外」，並寫下他所會晤的臺灣人士看法「如照目前情況演變下去，臺灣將成為世界最落後之國家」。細川認為，臺灣的媒體狀況如同日本戰時，即便承諾放寬日本出版品進口，國策未變下能否實現，恐怕未知。³⁴

與御手洗和細川相同，矢部貞治亦以日本戰時的經驗理解當時臺灣，並對文化交流一事感到不樂觀。矢部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甚至在蔣的面前提及無法理解臺灣何以查禁批判社會主義不遺餘力的經濟學家小泉信三的作品。³⁵矢部認為，捍衛自由不該用限制自由的方式進行，如果反對共產專制主義卻限制了言論自由，將使得自己也成為極權體制，同時，學術發展貴在自由，若多所限制，將無法真正促進學問。³⁶反過來說，由於日本學術、出版與文化界多元並陳，扣除少數倡導共產主義者，當能協助臺灣開拓眼界。³⁷這也就是為何矢部會在蔣介石前提出聯席委員會建議的原因。

綜合此次訪問團成果，雖屬投石問路，但已取得蔣介石首肯，確立能從雙方共組出版品審查機構開始，促進雙方文化交流。日方緊抓此點，回國後積極運作。上述三人是出版品進口事項中較具影響力的發言者，從後續發展來看，矢部的重要性逐步上升，成為日方主要的推動者。

³³ 御手洗辰雄，〈徹底した言論の統制 学問的には鎖国状態〉，《読売新聞夕刊》，1956年9月17日，第1版。

³⁴ 細川隆元，〈臺灣文化界之現況〉，《新國策》，1956年9月15日。此為外交部所譯版本，意謂臺灣亦注意團員返日後相關言論。「葉公超致張群函」，1956年11月1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二)」，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

³⁵ 小泉信三(1988-1966)曾任慶應大學校長，雖反對共產主義但又對此有深入研究，為日本重要經濟學者。

³⁶ 矢部貞治，〈關於中日學術交流問題〉，《新國策》，1956年9月15日(外交部譯本)。「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二)」。

³⁷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座談會速記錄」，1956年8月22日；「反共座談會速紀錄」，1956年8月2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

三、制度化的協商管道：中日合作策進會(1957年-)

非常態性質的訪問團達成雙方親善的效果，但若欲實質合作仍需後續的落實配合。外交部在訪問團回日本後，整理了訪臺期間所提各項問題辦理情形，在東京設立聯席委員會一事被列入清單內，並諭令駐日大使沈觀鼎與該團負責人聯繫。³⁸另一方面，在雙方的積極運作下，從出版品處理單位一躍成為雙方常態且全面性的意見交換組織，可說 1950 年代中期之後臺日關係的深化，源起自出版品進口議題。

(六)從聯席委員會到中日合作策進會

訪問團回日本後，很快地就希望達成訪臺期間的協議，立刻積極運作。訪問團總幹事矢次一夫於九月底致函張群，希望在原本較為紛雜的協議事項中，選擇較簡單並富有政治性的項目予以優先實行，所提的即是蔣介石亦答應的出版品聯席委員會。矢次與駐日大使館商談後，提議聯席會成員 10 人，雙方代表各半，日方成員由之前訪問團中選任 5 人，臺方則由旅日中國人士出任，由張群或大使館選任。信中並謂日方推派代表為御手洗辰雄、矢部貞治、鍋山貞親、崛越禎三與矢次一夫擔任。文末並強調此舉將給予「中共」重大打擊，希望張群能予以促成。³⁹事實上，石井光次郎返日後亦拜訪駐日大使館提起此事，而前述御手洗辰雄在《讀賣新聞夕刊》揭露蔣介石應允一事，可知日方動作不斷，使得大使館倍受壓力。⁴⁰

正當公文在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與省政府教育廳(日文書刊主管單位之一)之間層層轉達之際，日方又有新的提議。矢次一夫再致函張群，將聯席會提升為「日華親善協力委員會」，性質是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民間諮詢機構，除了雙方成員各擴增為 10 人，各推 3 人為常務委員，希望谷正綱與黃朝琴亦能加入，並提出具體時程，希望在該年 12 月中旬召開成立大會。⁴¹時序至 12 月初，日方再表示臺灣由中日文化經濟協會與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會出面，召集臺灣民間有力人士參與，但也對時程延宕表達失望。⁴²另一方面，11 月底駐日大使館也主張接受此擴大的民間委員會，建議外交部在此委員會下設立小組，專門處理日文書刊進口審查，並優先辦理此項以符合日方期待。⁴³

在日方一再要求下，終於在 12 月 14 日，由張群邀請何應欽、谷正綱、張其昀、沈觀鼎、沈昌煥、汪公紀等人，於總統府秘書室磋商日方提議，獲致重大結論。簡單而言，決議此機構稱為「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性質為促進政治、經濟與文化合作，並先檢討石井訪問團所

³⁸ 「外交部呈行政院稿」，1956年11月2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4。

³⁹ 「矢次一夫致張群函」，1956年9月29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⁴⁰ 「沈觀鼎致葉公超函」，1956年9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⁴¹ 「矢次一夫致張群函」，1956年11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⁴² 「駐日大使館電文」，1956年12月5、6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⁴³ 「沈觀鼎致葉公超代電」，1956年11月28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提意見與問題，以及擬定委員名單。⁴⁴按徐年生的研究，從專門處理出版品的聯席委員會擴大為合作策進會，是由臺灣方面所提議，然而從上述過程來看，顯然臺灣並不積極。⁴⁵不過，在原本堅守「文化主權」和拉攏日方的戰略利益兩者之間，中華民國政府選擇了前者，能決定此方向，並以高規格研討對待，其中轉折恐怕仍然來自最高層的授意。至此，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露出曙光，但願意開放多少，必須看接下來的實質談判。

(七)文化小組前三屆成員

由於會議記錄繁簡不一，第一屆文化小組的成立過程與成員極容易掌握，但之後則逐漸簡略，僅知部分成員或出席名單，以下介紹矢部貞治擔任小組召集人，同時也是與出版品進口關係最深的前三屆文化小組成員。第一屆臺方成員由陳雪屏、吳俊升及張伯謹擔任，陳曾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吳俊升為當時教育部次長，兩人都是官、學兩棲，既有一定學術份量，又因行政經歷有資格折衝文化事務；張為駐日使館人員，由於當時有意借重駐日大使館進行部分審查工作，因此將張放入名單。第二屆之後汪公紀成為固定成員之一，他是另一個民間團體中日文化經濟協會的常務理事。第一屆日方成員由矢部貞治敦聘，赤松要與高山岩男均為學界人士，赤松為一橋大學經濟學者，為「雁行理論」的創始者，高山當時為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主攻哲學。第二屆的井口貞夫為前駐美大使，是日本外交界的前輩，有助折衝，而增聘的小泉信三曾任慶應大學校長，戰後並為日本皇室講學，從經濟學角度批判共產主義，小野秀雄則是日本「新聞學」的推動者，歷任東京大學文學部講師與囑託，當時則為上智大學教授。高山和小泉均，加上政治組的鍋山貞親，均為日本學界中的反共大家。

簡單而言，文化小組成員學術氣息濃厚，臺方多了政治實務，日方則較偏向反共人士。綜觀第四屆以後名單，日方文化小組的成員不斷變動，基本上似乎是由大學校長擔任召集人，偶將政治評論家納入，或許是為了宣傳。相對而言，臺灣方面後半期多皆由陶希聖擔任，教育系統與黨工似為主體。

表3 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前三屆委員名單

	臺方成員	日方成員
第一屆(東京) 1957年4月	陳雪屏(臺大教授、正中書局董事長) 吳俊升(教育部次長、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 張伯謹(駐日公使)	矢部貞治(拓殖大學校長) 赤松要(一橋大學教授) 高山岩男(日本大學教授)
第二屆(臺北)	陳雪屏、吳俊升	矢部貞治

⁴⁴ 此時擬定的成員中，谷正綱、黃朝琴、汪公紀、王撫洲、吳俊升等具官方身分，陳雪屏與羅萬偉為立法委員，楊雲竹、張伯謹與胡光泰為駐日大使館官員。「討論中日合作組織會議紀錄」，1956年12月1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⁴⁵ 徐年生，〈戰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關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頁142。

1957年10月	汪公紀(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 方豪、王星舟、朱新民、李樸生、陳固亭、張興周、游彌堅、劉真與謝東閔	高山岩男 井口貞夫(前日本駐美大使) 北村隆(前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所長) 增聘：小泉信三 小野秀雄
第三屆(東京) 1958年6月	陳雪屏、吳俊升、汪公紀	矢部貞治(召集人)

出處：〈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1957年9月，頁24-27，〈矢部貞治關係文書〉；「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二、三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5、0036。

表4 中日合作策進會第一屆委員名單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谷正綱	亞盟中國總會理事長	藤山愛一郎	東京商工會議所會頭
張厲生	國民黨秘書長	杉道助	大阪商工會議所會頭
黃朝琴	中日文經協會副會長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長	船田中	自民黨眾議院議員
陶希聖	中日文經協會文化委員會主委	松岡駒吉	社會黨眾議院議員
鄭道儒	中日文經協會經濟委員會主委	井口貞夫	前駐美大使
胡健中	中央日報社長	赤松要	一橋大學教授
林柏壽	臺灣水泥董事長	上村健太郎	前防衛廳航空幕僚長
陳雪屏	臺大教授、正中書局董事長	堀越禎三	經團連常任理事
羅萬俔	彰化銀行董事長、立法委員	細川隆元	評論家
吳俊升	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教育部次長	御手洗辰雄	政治評論家
王撫洲	中國和平自由協會常務理事 經濟部次長	矢部貞治	拓殖大學校長
汪公紀	中日文經協會總幹事	矢次一夫	國策研究會常任理事
		足立正	東京商工會議所會頭
		北村隆	前防衛研究所所長
		高山岩男	日本大學教授

出處：由於日方希望維原民間色彩，因此當之後藤山愛一郎與上村健太郎擔任官職，加上赤松要辭職，改由足立正、北村隆與高山岩男遞補。〈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1957年9月，頁3，〈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藏，檔號876/6/42。

(八)文化小組的成立與折衝

在策進會成立之前，面對日方開放出版品的提議，臺灣在文化方面亦設定數項議題。將第一案為「加強日中對共黨文化宣傳作戰」，第二案為「促成日本報紙雜誌對我態度之友好」，中日圖書交換與翻譯則為第三案，顯示政府仍不滿意日本出版品，在政治考量下雙方對文化交流的差距頗大。⁴⁶策進會成立後，該會既由出版品審查之議而來，在組織上最早討論與確立常態性小組的成員即為文化小組，在討論問題上，第一個具體議案即為日方提出的「推進日本書刊進口輸臺案」。⁴⁷日本出版品進口成為雙方率先短兵交接、表達基本立場的戰場。

在現存的會議記錄中，可以清楚看見日方以文化問題作為談判的發起點。策進會成立之初，規約與議程都尚未決定，因此召開非公開的第一場會議(1957.4.2)討論隔天的議程，日方代表御手洗辰雄迫不及待地提議，第一個議案應為文化問題，包括臺灣輸入日本出版品、輸入的方法、增加輸入日本電影至臺灣、學生交換留學以及學者交流等具體議題。臺灣代表陳雪屏立即表達疑慮，因為隔天的會議為公開形式，希望就較有共識的議題討論，日本報紙輸入之類的問題較為複雜，言下之意希望能暫時擱置報紙輸入的討論。御手洗並未放棄，隨即表示可以就輸入的方法討論，而不必決定哪些報紙可以輸入。眼看提案越見積極，谷正綱出面緩頰，表示公開會議有媒體在場，若雙方討論日本報紙輸出至臺灣有不同意見時，恐怕傷害日本新聞界的情感，因此希望雙方能各派三位委員，先行討論可在公開會議上進行的議案。⁴⁸矢部貞治為日方代表之一，擔任文化方面議題的負責人。這可視為雙方的第一回合攻防。

在將文化問題排入議程後，翌日下午的公開會議，由矢部貞治發難，臺灣方面則由陳雪屏負責回應。矢部表示充分理解臺灣身處反共的第一線，在「準戰時體制」之下，必須特別警戒思想戰的攻防，然而日本並非所有出版品皆涉及共產主義，為了讓彼此的立場更為契合，重提兩國派代表設立聯合委員會共同審查，當然，他也再提前一年蔣介石也贊成此方式。陳雪屏則回答，自從石井訪問團來臺後，政府已起草新的日本出版品輸入辦法，放寬限制：⁴⁹

- 1、不妨害反共抗俄國策。
- 2、不為共匪宣傳。
- 3、不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陳雪屏表示，只要符合上述條件，在臺北的進口書商取得政府許可後就可輸入日本書籍，而日本書商只要取得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許可，亦可輸出，已大幅簡化手續。陳氏還特別舉例在「反共抗俄」的軍事體制下，對香港的中文雜誌與新加坡的英文雜誌亦以相同原則辦理，非單獨針對日本出版品。陳雪屏在會上甚至還提出強化雙方交流的具體項目，包括學術、藝

⁴⁶ 「中日合作策進會第一次籌備會報告」，1957年3月1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⁴⁷ 〈文化合作報告〉，「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五冊，1959年4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49/031.3/41。

⁴⁸ 日方為矢次一次、矢部貞治與堀越禎三，臺方為陳雪屏、胡健中與黃朝琴。〈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1957年9月，〈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學圖書館藏，檔號876/6/42，頁24-27。

⁴⁹ 〈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頁63-67。

術方面的交流與圖書交換等，日方接受此變動，矢部隨即表示不再堅持聯合委員會，而御手洗辰雄則開始將焦點轉向匯率限制的放寬，以及日本電影輸入配額的增加。就在確認交流原則後，雙方決定將具體問題移至文化小組討論，該小組臺灣方面由陳雪屏任委員長，成員為吳俊升與張伯謹，日方則由矢部貞治任委員長，成員為赤松要與高山岩男。⁵⁰

陳雪屏所言並非空言，他所指的是 1957 年 2 月行政院核定的「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事實上，從石井訪問團回去後，1956 年 10 月決定將日文書刊的審查單位由臺灣省教育廳移至教育部，並打算在東京的駐日大使館增設「中日聯合審查會」負責初審。⁵¹而該工作辦法除了簡化進口原則為上述三點，並增加小額參考用書的申請規定，學術性刊物得交由各大學相關科系審查。⁵²簡單來說，在策進會之前，聯席會的作法已寫入法規，但陳雪屏隱蔽了此一事實。這中間的轉折仍有待釐清，但可以確知的是，臺灣願意有條件開放進口，但審查的主導權希望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何以從聯席委員會擴大為策進會，矢部仍重提聯席委員會一事呢？按矢部的構想，此一聯席委員會常設東京，並有半數日方委員參與，雖屬諮詢性質，但具有實質審查功能，日方可積極提出書單，就近發揮影響力。但是改為策進會後，設計上半年輪流在東京與臺北開會，其下所設的文化小組頂多半年碰面一次，僅能談論原則性問題，在處理實務上功能大為弱化。矢部願意退讓頗值得玩味，推敲雙方發言，矢部或許將重點放在日本書商取得駐日大使館許可即能進口之辦法，果真如此，更為簡便，之後吳俊升暗示駐大使館正就技術性問題協商，很可能在東京就能審查出版品，更增添想像。⁵³然而，設法阻擋常設性聯席委員會，乃為策進會成立前臺灣方面所擬策略。⁵⁴從後見之明來看，最終大使館審查之議被擱置，日本出版品進口仍被安排由臺灣單方面審查，單從會議記錄或是法規文字，並無法確知真實運作情形。

有關書籍與雜誌進口問題，大致在第一屆已有基本共識，第二屆「促進中日文化界『思想反共運動』案」，僅是更加強調反共立場，出版品進口問題未再做太多討論。較有交涉的是在第二屆結束後所提的報紙進口問題，委員井口貞夫會後至駐日大使館，要求先准進口《產業經濟新聞》，或從《產經週刊》開始⁵⁵。報紙問題一向複雜，此事涉及總動員運動會報文化組、國民黨中央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宣指會」)，以及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等單位研討，最後教育部核准《產經週刊》進口，宣指會則回復策進會，說明日本報紙銷臺最低條件：⁵⁶

⁵⁰ 〈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頁12、67-68、72。

⁵¹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303次會議記錄〉，1956年9月19日，黨史館藏，檔號：會7.3/443。

⁵² 「行政院令核准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1957年2月9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檔案》，行政院藏，檔號0045/1-1-8-10-2/23。。

⁵³ 〈日華協力委員會懇談會記錄〉，頁125-126。

⁵⁴ 〈陳慶瑜(行政院秘書長)致沈昌煥(外交部次長)函〉，1957年3月12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⁵⁵ 「駐日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57年10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二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5。

⁵⁶ 「中央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第二小組第六次會議記錄」，1958年1月29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二冊。

1. 在內容上不採登匪幫通信社新聞及圖片，不轉載匪方報刊文字，並不作有利於匪幫之言論或記載。
2. 在稱謂上，對我須一律改稱中華民國，對匪幫則一律改稱「北京政權」或「毛政權」，並不得對毛匪澤東及周匪恩來加稱「主席」或總理字樣。

凡日文報刊能履行上述條件者，我國決歡迎其來臺行銷。

由於上述條件幾乎無法達成，一直至 1970 年代末期，日文報紙仍是高度管制物品。重要的政治案件「余登發案」被起訴理由之一，即是他卸下公職後，仍違法閱讀、解說與影印《朝日新聞》有關「匪酋黃華、葉劍英統戰文字」，成為「為匪宣傳」的證據。⁵⁷前駐美大使、日本外交界的前輩井口的遊說，仍無法改變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報紙的疑懼。

四、矢部貞治與出版品進口問題

矢部在歷次會議中的發言已如前述，但他是何種背景、如何影響他的上述發言呢？以下將從其經歷以及和出版品相關的著述中，簡單疏理，因篇幅限制，詳細的學術思想暫時不談。矢部 1902 年生於鳥取人，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留學英、美、法、德諸國，政治學博士，曾任東京帝大、早稻田大學等校教授與講師，1955 年任拓殖大學校長，為政治學權威。⁵⁸矢部在東京歷任助手、助教授與教授共二十年，太平洋戰爭時期加入後藤隆之助組織的昭和研究會，思考如何由下而上地整合國民力量，以改革官僚統制與政黨無力化的敝病，並將研究結果送給首相近衛文麿。然而最後日本成立由上而下的大政翼贊會，與矢部的理想相距甚遠，遂與政府無涉。⁵⁹不過，當戰後聽到美國佔領軍發布近衛文麿的逮捕令時，決定請辭東大教授職位，並謝絕一切邀請，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當了六年的「浪人」，⁶⁰一直到 1952 年擔任早稻田大學講師，1955 年時受邀擔任拓殖大學校長，並參與憲法調查委員會與公安審查委員會。矢部的著作頗豐，偏重政治學、民主制度與憲法的理論與實際運作，並在浪人時期撰寫近衛文麿傳記，檢討日本戰時經驗。⁶¹由其經歷來看，矢部將政治學與國家命運相互聯結，堅守自己原則，在戰前(含戰爭時期)主張民主制度，受到右翼陣營與文部省壓力，對於否定人性尊嚴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帝國主義亦無法接受，可謂抱持始終一貫的理念，欲協助日本民主制度鞏固的學者。⁶²

從上述簡單的經歷，或可推知何以矢部在出版品問題上，一再表明言論開放與反共的關係。從被安排至金門參訪、文化思想上的管制，以及在歷次會談中臺灣官員的回答，矢部皆得到一強烈印象，亦即臺灣處於戰時體制之下。矢部很清楚知道戰時如何管制言論，但是認

⁵⁷ 蕭李居(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文建會，2008)，頁331-332、490-492。

⁵⁸ 「團員履歷」，「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一)」。

⁵⁹ 坂田善三郎，〈東大時代の矢部先生〉，《海外事情》，10:10(1962.10)，頁36。

⁶⁰ 矢部貞治，〈自伝的隨想〉，《海外事情》，7:2(1959.1)，頁3。

⁶¹ 〈矢部貞治博士略歴〉、〈矢部貞治博士著作表〉，《海外事情》，10:10，頁2-5。

⁶² 草野文男，〈戦後における矢部博士〉，《海外事情》，10:10，頁49-51。

為若欲與共產主義對抗，除了軍事之外，不論是思想戰或心理戰，最好的「免疫」方式不是隔絕，而是應該確保開放與自由批判的空間。另外，如果連電影等娛樂性產物被高度限制，或是日本批判共產主義的權威學術著作無法進口，矢部悲觀地認為臺日雙方無法進行真正的文化交流，就此點而言，他認為臺灣方面應該反省與檢討。⁶³

然而，矢部對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並非抱有惡意，毋寧說在政治學的理論和實際出發，甚至是帶有善意的期待。矢部對於蔣介石宣布放棄對日求償，以及所任職的拓殖大學與殖民時期臺灣的密切關係(190年由臺灣總督桂太郎所創臺灣協會而來)，使得他對臺灣有特殊情感。同時，對於多次與共產黨合作競爭而正在努力的國民黨，也抱有深切好奇，並認真閱讀《蘇俄在中國》日文摘譯版，希望能吸取與共產黨鬥爭失敗的經驗，並解答何以蔣介石能自信地認為五年內可以「反共大陸」成功。⁶⁴就這點而言，矢部可謂欲認真理解臺灣反共處境與實況。

矢部除了從學術和言論自由角度思考出版品問題，亦就實務層面考察。在矢部的資料中，存有名為〈向臺輸出日本出版品的瓶頸〉的手稿，此份稿件不知寫於何時，但他從貿易障礙的角度剖析日本出版品輸臺的困難，約可推知是在接觸業界後所寫下的觀察。他認為日本出版品輸出至臺灣的障礙有三：貿易配額過少、審查時間太長，以及出版品價格太高。文中道出當時臺灣輸入日本出版品的實況，由於臺灣不准新設貿易商社，只能由既有的十二、三家商社負責出版品輸入，實際運作的只有五家。這些商社手上握有兩三件輸入許可權，每個月只能行使一件，因此商社必須輸入最有利益的商品如文具或機械，如此便壓縮了出版品輸入的空間。另外，由於換匯配額太少，必須購買黑市外匯，墊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出版品在臺價格約為在日本的兩倍半。⁶⁵矢部也與「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接觸，該單位負責將日本出版品輸出至全世界各地，並整合日本出版社對外參加書展，該會在1955年舉行了第一次的海外日本書籍展覽會，其地點即在臺北。⁶⁶

由上可知，矢部以其學者性格，對民主信念的堅持，既批判中華民國政府的出版品進口政策，但也理解處於戰時狀態下的不得已，遂如講學般諄諄教誨，反覆陳述言論與學術自由對反共的重要性。如此對中華民國政府不帶惡意的學者，擔任出版品進口交涉的主要人物，毋寧對臺灣是幸運的，但臺灣方面部分無法改變立場的堅持，也使得此類溫和且具聲望的學者，無法替臺灣多做解釋。這對期待透過社會名望人士改變日本輿論的政府當局而言，可謂失望。

⁶³ 矢部貞治，〈國民政府訪問の感想〉，《海外事情》，4:11(1956.11)，頁17-22。

⁶⁴ 矢部貞治，〈中国のかなのソ連〉，《海外事情》，5:9(1957.9)，頁23-30。

⁶⁵ 矢部貞治，〈台湾への日本出版物の隘路〉，日期不詳，〈矢部貞治關係文書〉，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図書館藏，檔號6118/34/220。

⁶⁶ 〈PACE50年の略史(1953年-2003年)〉，《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50年史》(東京：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2003)，頁128。

五、小結

本文考察了 1950 年代中期，是透過哪些人和會議過程，促成了中華民國政府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的轉變。研究指出，日本並不滿意出版品被臺灣限制進口，早在 1950 年代初期即開始要求開放，「中日和約」簽訂後，交涉層級越來越高，適逢石井訪問團來臺，雙方長久以來的懸案，終於有了高規格的接觸談判。而臺灣希望加強日本國內的反共勢力，並實現亞洲反共聯盟的戰略構想，因此積極回應日方的要求，並以文化交流之名，欲深化彼此關係，並使國際上認識到雙方的親善合作。雙方在部分基本歧異的立場上，展開了多回合的交談判。

一般認為，1956 年的石井訪問團促成了隔年開始的「中日合作策進會」。這確實無誤，但本文補充指出，所謂的「促成」並非理所當然，原是為了出版品審查，雙方共組聯席會之議而起、最後擴大而成為策進會形式。石井訪問團定調為民間性質，召集政經與文化界人士，展現石井派及其外圍智庫國策研究會的人脈，相對而言臺灣方面出席文化小組會議者，多為黨政教育、宣傳和新聞單位主管，雖亦有學者參與，但官方色彩濃厚。石井訪問團最大的突破在於得到總統蔣介石的首肯，願意雙方共組聯席會，篩選日本出版品以利進口，其中向蔣當面提出此議的矢部貞治，回國後將此事披露於大報的御手洗辰雄，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石井訪問團雖得到承諾，但後續的發展則有賴雙方落實。日方的國策研究會幹事長矢次一夫，以及臺方國民黨內日本事務主要管道負責人張群，兩人的往來協調促成了策進會。不過，原先日方僅要求在中華民國駐東京大使館下設置雙方代表各半的聯席會，專事審查出版品，面對日方的積極詢問，臺方最後決定將層級拉高，改為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層面的策進會。臺灣的想法很簡單，純粹的審查聯席會流於事務性，且容易讓日方介入審查機制，但拉高層級後一方面顯示雙方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則可強化反共要素，達成政治目的。

中日合作策進會召開後，第一個討論案以及第一個成立的小組，皆為文化領域。在日方具體提議審查聯席會的情況下，曾任省教育廳長的陳雪屏說明了日本出版品進口的新政策，簡化進口標準，新增參考用書申請流程，學術用書可由大學相關科系審查，並暗示經駐東京大使館核可通過的日本書商，其出版品可進口。上述說明使得主要提議的矢部貞治表示接受，出版品議題大致底定，第二屆欲促使報紙進口未果，之後各屆文化小組對進口問題僅原則性呼籲，未有實質突破。從後見之明來看，上述新政策確實部分放寬了日本出版品進口限制，而此一轉變與石井訪問團和策進會的壓力有直接關係。

本文最後集中於策進會的文化小組召集人矢部貞治，說明一個基於學術理由，對臺灣或中華民國政府抱有一定期待的學界人士，批評臺灣對言論的控制。為了貫徹其民主信念，同時也反對以極權方式對付極權，矢部主張臺灣應該開放言論，以增加對共產主義的免疫力，在思想戰上贏得勝利。然而，矢部也以戰時狀態理解臺灣，認為臺灣難以輕易改變政策，對於文化交流感到悲觀。就此而言，臺灣方面原先希望藉由文化交流爭取日本有聲望的社會人士為臺灣發聲，壯大反共力量的構想，並未實現。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7年9月2日

計畫編號	MOST 105 - 2410 - H - 004 - 066 -		
計畫名稱	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		
出國人員姓名	林果顯	服務機構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出國時間	2017年2月7日至 2017年2月12日	出國地點	日本東京
出國研究目的	<input type="checkbox"/> 實驗 <input type="checkbox"/> 田野調查 <input type="checkbox"/> 採集樣本 <input type="checkbox"/> 國際合作研究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移地研究，係根據研究計畫所核定出差旅費，至日本東京蒐集研究所需一手資料。本研究涉及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的談判人員，因此在國內資料蒐集告一段落後，利用寒假期間至日本東京訪查日本政府檔案，並鎖定重要談判人員，進行一手史料與二手研究的蒐集工作。

本次主要探訪檔案館為外交史料館、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以及國會圖書館，以下簡述所藏資料內容。

1. 外交史料館藏有日本與中華民國每年貿易談判資料，雖未出版品談判非主要內容，但可從每年決議貿易數字得知出版品所佔貿易比重。
2. 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藏有矢部貞治文書，矢部為代表日方與臺灣談判出版品的主要負責人，所留手稿、剪報以及其日記，可協助理解日方負責談判人員的思想與人脈。
3. 國會圖書館藏有1950年報紙與雜誌有關出版品談判的報導，以及談判人士的回憶文字，並有重要談判人士的二手研究。

此外，在初步整理矢部貞治文書時，發現 1950 年代成立的「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對於整合日本出版界對外國輸出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前往該會訪問，並取得該會所出版「會報」及五十週會史料集，有助於本計畫的進展。

二、研究成果

詳細史料蒐集成果如下。

(一)外交史料館

管理番号/分類番号	MF/CR 番号	件名/概要
B'.5.2.0.J/C(N)1	B'-0023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第 1、2、3 卷
B'.5.2.0.J/C(N)1	B'-0023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1953 年度取極) 第 4 卷
B'.5.2.0.J/C(N)1	簡便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第 5 卷
B'.5.2.0.J/C(N)1	簡便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第 6 卷
B'.5.2.0.J/C(N)1	簡便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第 7 卷
B'.5.2.0.J/C(N)1	簡便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第 8 卷
B'.5.2.0.J/C(N)1	簡便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第 9 卷
B'.5.2.0.J/C(N)1	簡便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第 10 卷
B'.5.2.0.J/C(N)1	簡便	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關係一件 第 11 卷
I'.1.8.1.1-56	I'-0101	本邦における協会及び文化団体關係日華協力委員会關係第 1、2 卷
I'.1.8.1.1-56	I'-0102	本邦における協会及び文化団体關係日華協力委員会關係 第 3、4、5、6 卷

(二) 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

通番号/ID 箱番号/箱の通番号/束 箱番号/束/束の通番号/表題/年.月.日/メモ

- 6118/34/220/34/8/4/台湾への日本出版物輸出の隘路/理工学図書ニュース原稿用紙
- 573/4/6/4/1/6/海外事情/5 卷 12 号/1957/12/5/矢部「台北訪問雜感—再び台湾を視察して—」
- 876/6/42/6/3/15/懇談会記録/1957 9/1957 年 4 月 2 日~4 月 5 日の日華協力委員会の第一回第二回(公開・非公開)委員会・懇談会の速記録、日華協力委員会委員名簿、共同声明
- 877/6/43/6/3/16/日華協力委員会第五回總會記録/1959 12 19/1959 年 10 月 15 日~21 日の總會・予備會議・常任委員会の概況
- 1495/11/4/11/1/4/中日合作策進委員会第二次委員會會議記録/1957 10 6/中華民國 46 年/矢部は日本側委員 1957 年 10 月 6 日~8 日
- 6117/34/219/34/8/3/日華協力委員会第三回總會記録 1958.10.1/
- 6121/34/223/34/8/7/「出版文化國際交流会」発会に際して//趣旨は出版物海外紹介の現状と現在の出版物の輸出状況
- 6182/34/284/34/10/41/日華協力委員会第四回總會經濟小委員會決議/1959 1 14/於台北市
- 6181/34/283/34/10/40/文化關係決定並要望事項

通番号	箱番	箱の通	種類	表題	作成者等
2665	16	160	書類	日本出版会役員／委員名簿	日本出版会
2866	16	361	書類	日本出版会書籍委員会規程	日本出版会
6122	34	224	冊子	会報 7号	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
6123	34	225	冊子	会報 9号	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
11448	57	586	書簡	矢部貞治宛葉書	世界民主研究所
12179	59	93	冊子	亜細亜政経資料第 13号 最近の台湾事情	世界民主研究所
4290	25	127	雑誌	台湾青年 113号	台湾独立聯盟
5896	33	110	雑誌	台湾青年 283号	台湾独立連盟
1318	8	81	雑誌	新国策 4巻 24号	国策研究会
1439	10	26	雑誌	中国与日本⑥	中日文化経済協会
589	4	22	雑誌	海外事情 10巻 10号	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
8522	48	84	雑誌	海外事情 5巻 9号	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
8525	48	87	雑誌	海外事情 7巻 2号	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

(三)國會圖書館與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

1. 伊藤隆，《昭和十年代史断章》，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
2. 《矢部文庫分類目録》，東京：拓殖大學圖書館，1978。
3. 矢部貞治，〈日本のとるべき国際的進路〉，收入：高山岩男，矢部貞治(編)，《新しい日本の進路》，東京：勁草書房，1953。
4. 矢部貞治，《世界政治情勢と日本の進路》，東京：労働出版，1949。
5. 佐藤元英、黒沢文貴(編)，《GHQ 歴史課陳述録：終戦史資料. 上》，東京：原書房，2002。
6. 《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 50 年史》，東京：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2003。
7. 藤村道生，〈伊藤隆著「昭和十年代史断章」〉，《史學雑誌》，91(7)(1982.7)，頁 1192-1198。
8. 源川真希，〈戦前日本のデモクラシ---政治学者矢部貞治の内政・外交論〉，《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287(1998.3)，頁 1-63。
9. 源川真希，〈「大東亜共栄圏」思想の論理とその帰結--政治学者矢部貞治を中心に〉，《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306(2000.3)，頁 107-144。
10. 〈矢部貞治博士略歴・著作表〉，《拓殖大学論集》，32、33(1963.4)，頁 3-6。
11. 矢部貞治，〈国際情勢とわが東亜政策の進路〉，《大陸問題》，1(9)(1952.9)，頁 20-25。
12. 〈矢部貞治還暦記念号〉，《海外事情》，10-10(1962)。
13. 《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会報》，1(1956.7)-95(1975.10)
14. 《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 50 年史》，東京：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2003。

三、建議

無。

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林果顯		計畫編號：105-2410-H-004-066-				
計畫名稱：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戒嚴時期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關鍵人士：以矢部貞治和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成員為中心〉，「走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學術研討會，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歷史學會，2017年5月21日。	
		研討會論文	1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級兼任助理2名，協助計畫資料蒐集與統整。
		碩士生	2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本文在學術成就上，釐清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就日本出版品進口一事，雙方如何折衝談判的過程，並掌握雙方關鍵人物，對於理解戒嚴時期臺灣篩選外來資訊的決策過程，有補足過去研究空白的意義。過去有關戰後臺灣的日本出版品，多從新聞言論管制面，或是文化政策著手，描繪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對內部肅清外來資訊的圖像。本計畫從外交層面著手，指出外國出版品並非單純內政治理的項目，特別是在1952年的「中日和約」生效後，中華民國政府面臨來自日方的壓力，必須透過談判決定哪些出版品必須阻擋，哪些出版品則可以進口。要言之，本計畫釐清日本出版品進口決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以修正並補充對戒嚴時期臺灣言論環境的認識。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計畫發現1956年的石井訪問團，以及1957年的「中日合作策進會」正式將出版品進口至臺灣設定為重要交涉事項。其中，策進會下的文化小組日方代表以矢部貞治為首，臺灣代表以陳雪屏為首，展開多回合的交涉，促使中對民國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調整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